

仁人王富仁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

王富仁教授

2017年5月2日,著名学者、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教授驾鹤西归。

王富仁生于1941年,是名满学界的知名学者,身上有无数耀眼的头衔,但他的名片上却只有“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”简单一行字;据说他曾自我介绍说:“王富仁,姓王,为富不仁;不过名不副实,有仁,不富。”王富仁就是这样一位谦逊、低调、幽默、豁达的仁人之士。

与大部分专家学者不同,王富仁是个大器晚成的人,直到近40岁才与学术研究沾边。

王富仁出生于鲁西北一个农民家庭,他的父亲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工作。对于自己的身世,王富仁在文章中这样写道:“我是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的,从小接触的是农民,但我父亲因别人的帮助,上了几年学,知道一个中国人应当爱自己的国家,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1946年之后他当了一个小官。这使我有了读书上进的机

会,成了一个现在叫做‘知识分子’的分子,并且成了一个‘城市人’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王富仁的父亲成为当地文教部门的负责人,王富仁也和母亲从农村进了城。与普通农家子弟相比,王富仁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,1962年,21岁的王富仁考进了山东大学外文系。

当时王富仁虽然已经喜欢鲁迅,阅读鲁迅,但还没有要依靠鲁迅“吃饭”的意思。那个年代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不高,王富仁学的是俄语,成

绩很突出,所以考大学时就选了个外语的饭碗。王富仁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研究俄罗斯文豪契诃夫,准备“吃”契诃夫这碗饭。

1962年王富仁刚进大学时遭遇自然灾害饿肚子,1963年背了一年俄语单词,1964年和1965年搞社教,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第二年便稀里糊涂地毕业了——五年的大学生涯至此结束。

大学毕业后,王富仁在学校和农场锻炼了三年,1970年被分配到山东省聊城四中任

教,一干就是八年。1978年,王富仁考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,开始了他的鲁迅研究之路。

1982年,王富仁又考取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,师从李何林教授,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。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,王富仁的博士论文《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——〈呐喊〉〈彷徨〉综论》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,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坛思想启蒙的重要标志。



王富仁博士论文《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》



王富仁的《中国文化的守夜人——鲁迅》

王富仁是个随和、幽默、不修边幅的人,他的同学王培元对此印象颇深。

1982年,王培元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,入校后得知,导师李何林还招了两个博士研究生,王富仁就是其中一个。王培元早就听说过王富仁的名字,1980年代初,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前筹备,当时筹备小组收到一篇题为《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》的文章,水平非常高。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王富仁,当时他不是正式与会代表,论文却被会议选中,会后从170多篇论文中选出30篇,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选,王富仁此文又被选中。一时间,王富仁成为鲁迅研究界的一颗新星。

1982年4月,听说王富仁要从老家进京入学,王培元和同学兴奋地去车站接站,心想

这个有才的大师兄一定是位风流倜傥的英俊小生。2017年5月18日,王培元在《送别王富仁》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:“在月台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,富仁兄拎着一个旧得有些发白的老式黄帆布衣箱,笑着朝我们走过来。他的衣着模样透出一股泥土气,看上去就像一个来自乡间的村镇干部。心里不免暗自诧异,这样浑身土气的人,怎么就写出了那么好的文章!”

王培元和王富仁宿舍隔得很近,很快便熟悉了,他们经常一起散步、串门、聊天。有一次王富仁参加一个“高知”学习班,回来讲了一件趣事,逗得王培元他们哈哈大笑。原来学习班成员大都是中科院和各大高校的自然科学学者,人文类的大概就王富仁一个。他发言开口就是中国如何如何,中西方文化怎样怎样,讲得那些人一

头雾水。王富仁平日从事中国文化和鲁迅问题研究,劣根性、思想启蒙、中西方文化这些词对他来说是信手拈来,但对于那些理工类的科学家来说,就感到相当陌生了。

著名作家和学者梁鸿是王富仁的学生,她的《中国在梁庄》和《出梁庄记》轰动一时。梁鸿读博士时,王富仁还住在北师大院内的丽泽楼,梁鸿和同学每周去上一次课。上课时王富仁家里人很多,有博士生、硕士生,有慕名而来的友人和同学,甚至还有专程从外地赶来的鲁迅研究者。人们围坐在客厅的沙发和高凳,王富仁则坐在一把黑色转椅上,手里燃起一支香烟,侃侃而谈。

一支香烟还没有熄灭,另一支已经接上,很多时候,王富仁只顾说话,香烟已经燃尽了才发现,他便向同学们笑笑,再点上一支继续谈话。梁鸿在怀

念老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:“说是上课,其实是聊天,说是聊天,又是上课,我们从那长对话里所汲取到的知识和精神,要远远大于书本中所学。我记得他书房天花板上的石膏已经脱落,露着黑色墙体,椭圆形状,从下往上看,就像星空中的一个黑洞。我们就在那黑洞下面,谈鲁迅,谈自由精神,谈文学与生活。”

对于学生而言,王富仁兼有老师和父亲两种身份。梁鸿在北师读博期间,家安在郑州,有时想家了,梁鸿便试探着说:“老师,我想回家。”王富仁总是不等她说完便说:“回吧,赶紧回吧。”那语气就好像梁鸿回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,他要尽全力去支持。“直到此刻,那一声声的‘赶紧回吧’还在我耳边,带着点含混的、甜蜜的笑意”,梁鸿忆起当年的往事,依然记忆犹新。

□ 大器晚成的齐鲁子弟

□ 生活中的王富仁

□ 作序人生

梁鸿博士毕业十几年,搬家无数次,扔掉许多东西,却始终保留着王富仁为她修改的博士论文《外省笔记(20世纪河南文学)》。红色小字密布文稿的天头地脚,从字句的推敲到整体结构的安排,王富仁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。

后来《外省笔记(20世纪河南文学)》出版,王富仁为弟子作了五万字的长序《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》,讨论中原文化、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,讨论作家在此文化中的选择与割舍,为河南文化和河南文学正名。

王富仁为这篇序文花了几

个月的时间,参考了《殷商史》等重要历史典籍,做了许多读书笔记。后来出版社提出将序言压缩一下,不料一向随和的王富仁却勃然大怒:“一个字都不能动,我写的都是经过字斟句酌的。”这是梁鸿第一次看见老师发火,也明白一件事,那就是要珍惜你的文字和思想,不是不让人改,而是你在写的时候,要赋予它真正的价值。

重庆国学院院长刘明华是王富仁的好友,1990年代中期,刘明华对中国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感兴趣,经过一段时间的读书和思考,写出《大同梦》一书。当时这本书是北京一家

出版社和台北一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的一种,书稿完成后,恰逢两岸风云变幻,这一合作计划搁浅。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各大学组稿,要出版“大学讲坛”丛书,《大同梦》入选,出版社要求作者请人作序。刘明华非常敬佩王富仁的学识和操守,随即去电征求意见,王富仁一口应承。

几个月后,一篇洋洋洒洒万余言的文章寄到刘明华手上,这篇《序》并没有就书中的架构、资料和观点发表看法,却是王富仁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集中清理和思考,对于全书有深化和提升的意义。刘明华每

与朋友谈到此书,都会提醒他们要好好拜读序言,因为序言比正文更深刻。王富仁去世后,刘明华发表文章回忆老友,再次提及王富仁和他的序言:“王老师的作序风格,就是真性情的表现。可以想像他在写序时,是在为一个话题思考,而不简单是在评论一本书的成就得失。这种特殊的表达,非真性情者不能为。”

可见,王富仁心中已把论文作为了一项研究事业。后来,汕头大学为先生出版了《王富仁序跋集》三册,王富仁一生作序甚多,不知这个集子是否还有遗漏?